

美欧跨大西洋联盟的战略协调之 现实困难与未来前景^{*}

陈新明 李源正^{**}

【内容提要】 特朗普上台以来，特朗普政府的中国政策出现了新的特点，主要表现为中美战略竞争关系加剧，两国关系中矛盾的一面有所激化。虽然美欧跨大西洋联盟在制定安全政策时首先考虑全欧洲，但是中国持续增长的地区和全球影响力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到美国和欧洲盟国的议题，跨大西洋联盟不能回避中国的防务政策，也不能无视中俄军事合作的继续发展。美欧针对中国的战略协调具有战略意义，它是西方影响世界秩序转型的重要资源，但在特朗普政府奉行“美国优先”政策的当下，这种协调的前提条件因现任美国政府政策的变化而明显减少，并导致了美国和欧洲盟国之间的重要分歧及协调困难。未来，美欧跨大西洋联盟针对中国的战略协调将会增多，但这种协调的命运将取决于联盟能否同中国结成有序竞争及合作的关系。

【关键词】 跨大西洋联盟 中国 美国 欧洲国家 北约 战略协调

中国既是亚洲也是亚太地区的重要国家，并且正在迅速成长为一个全球性大国，是当今世界上一支重要的战略力量。美欧跨大西洋联盟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

* 感谢《世界政治研究》匿名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笔者文责自负。

** 陈新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李源正，中国人民大学博士、人民出版社编辑。

束之后即是维系西方世界内部稳定的基石，随着中国的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持续增长，如何在涉及亚太地区特别是亚洲事务中处理好与中国的关系，是这个联盟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然而，自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政府奉行“美国优先”战略，对多边合作持冷淡立场，政策的不确定性有所增加，美国与其欧洲盟友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存在分歧，并导致美欧联盟针对中国因素的战略协调存在困难。这种战略协调的未来如何发展，是关系当今世界政治走向的重要问题。

一 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加剧中美战略竞争

特朗普赢得 2016 年总统大选，被认为是世界政治中飞出的一只“黑天鹅”，美国政府政策的不确定性显著上升，并引发了世界政治观察家的焦虑。特朗普上台初期，因国内激烈的党争，以及特朗普的反对派揪住有关“俄罗斯干涉”美国选举的话题不放，有关中国的话题一度被这些激烈争辩的话题所掩盖。在 2017 年 12 月美国发布的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中国与俄罗斯一样被确定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① 在 2018 年版的《国防战略报告》中，美国认为“中国将继续追求军事现代化，以便在近期取得印太地区的霸权，并在未来取代美国获得全球主导权……中国和俄罗斯现正在这个体系内削弱国际秩序，在从中受益的同时破坏其原则和规则。”^② 但在 2018 年中期之前，美国对华政策的讨论并没有引起美国政治家和观察家意见的尖锐冲突。

但实际上特朗普有着强烈的重塑中美关系的意愿，这与他的商人本性和以商业思维处理政治议题的习惯密切相关。特朗普从不掩饰自己的对华认知，他执政以来逐步贯彻和兑现了自己的竞选纲领。从总统任期一开始，特朗普就对中国提出严厉要求，抱怨中国的不诚实竞争以及不履行承诺给美国在双边贸易中造成了巨额逆差，尽管美国的要求远不限于贸易领域。特朗普政府并不打算限于获得短期的战术收益，仅仅迫使中国更多地购买美国商品以缩减贸易逆差。相反，美国采取了一系列举措，目的是在战略上削弱中国的经济和地缘政治地位，护持和延

①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ecember 2017, p. 27,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pdf>.

② “Summary of the 2018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https://dod.defense.gov/Portals/1/Documents/pubs/2018-National-Defense-Strategy-Summary.pdf>.

续美国的霸权。进入 2018 年后,随着国会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政府试图扭转局势,承诺要更多关注中国给美国造成的问题与挑战。对特朗普而言,这种战术是其信念合乎逻辑的结果,同时也是赢得国会中期选举的现实需要。在此背景下,2018 年 7 月,美国发动了对华“贸易战”,中美关系中冲突的一面显著上升,由此直接导致了中美战略竞争加剧。

(一) 特朗普政府挑起中美经贸摩擦

特朗普政府借经贸问题对华施压受到了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是美国对华政策共识的体现。

特朗普的内阁成员包括鲜明的“鹰派”和“温和派”。“鹰派”极力推动中美经贸摩擦升级。由美国贸易谈判代表莱特希泽、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席纳瓦罗组成的政府“鹰派”不仅要求中国降低贸易盈余,还要求中国做出重要让步:在推行“中国制造 2025”时放弃国家补贴,停止侵犯美国知识产权,调查并追究那些实施侵占美国知识产权行为的人员责任,消除美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的障碍,进行更大的市场开放,美国有权单方面监测和评估协议实施并对认定的违反协议的行为进行单方面惩罚。财政部长努钦和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则属于“温和派”阵营,他们的要价没有“鹰派”那么高,建议同中国达成贸易折中方案,以此避免两国间更激烈的冲突。这两派力量对特朗普总统都有影响,足以形成平衡,但是在最后时刻,天平倒向了激进路线的支持者一边。特朗普政府最终决定采取对华极限施压的策略,发动了对华“贸易战”。

支持以这种策略向中国施压的人不仅有特朗普总统和彭斯副总统,以及特朗普内阁负责经济事务的高级官员,还包括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主任伊勒特·比尔,以及美国国务院原政策规划事务主任基伦·斯金纳等级别较低的政府官员。2018 年 10 月 4 日,美国副总统彭斯在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就中美关系发表演讲时表示,中国推行与自由公平贸易不符的一系列政策,这些政策建立了中国制造业的基础,而以竞争对手特别是美国的利益为代价。^① 2019 年 4 月 29 日,斯金纳在华盛顿参加“未来安全论坛”时表示,国务卿蓬佩奥的团队正在制订一项针对中国的战略,该战略基于“与一个真正不同的文明作战”的理念,

^① “Remarks by Vice President Pence on the Administration’s Policy Toward China,”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remarks-vice-president-pence--administrations-policy-toward-china/>.

这在美国历史上将是第一次。^① 支持对中国持强硬态度的不仅有行政人员，同时还包括美国国会的许多议员。可以说，对华强硬是两党共识，甚至民主党阵营里反对特朗普的人也同意有必要积极对抗“中国的傲慢自负”。例如，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支持总统对中国的强硬立场，早在特朗普就任之初，他就敦促特朗普履行竞选承诺，宣布中国为汇率操纵国。舒默虽然在其他大多数问题上反对特朗普，但却认为特朗普对中国的行动在很大程度上符合他的看法，而奥巴马时期推行的对华政策与其主张差距更大。^②

特朗普使中美经贸议题升温还有为共和党赢得 2018 年秋国会中期选举的考虑。特朗普多次表示有可能与中国达成贸易协定，以此试图为共和党人争取更多选票，缓和一些人因为政府逐渐加码的对华关税和可能的对华制裁而产生的不满情绪。针对企业界的社会调查表明，白宫发起的中美“关税战”确实是因美国商界围绕贸易利益的不同看法而起。白宫对华政策中对抗施压倾向的加强引起了美国商界的高度关注，因为许多大公司与中国存在密切的商业合作关系，在华拥有巨大商业利益。签署一项包含有中国妥协内容的双边贸易协定，摆脱中美之间新一轮“关税战”的威胁，从本质上来说符合美国商界的利益，尽管这未必会停止美国遏制中国技术发展的努力。由于 2019 年美国经济增长速度已经放缓，这时同中国进行持续的贸易冲突对美国而言“受伤感”更为明显，特朗普也有意愿同中国达成贸易协定，但前提是中国必须满足自己开出的条件。

鉴于在中美双边贸易中持有大量贸易盈余，中国不可能以类似提高关税的办法长期回应美国的贸易压力。两国经贸联系的不对称也不可能使中国采取镜像式办法回应美国的措施。但是，由于特朗普遭到美国建制派的反对，党争和不同政治集团之间的分歧似乎鼓励中国等待特朗普的下台。例如，在检察官穆勒的调查中，传讯长期担任特朗普个人律师的科恩，这些都使中国当局思考，是应该在经贸谈判中做出重大让步，还是应该继续等待，因为特朗普因美国国内形势的变化可能会最终无力坚持他原先的要价，无力实现关于双边贸易协定的承诺。

① Joel Gehrke, “State Department Preparing for Clash of Civilizations with China,” <https://www.washingtonexaminer.com/policy/defense-national-security/state-department-preparing-for-clash-of-civilizations-with-china>.

② Naomi Lim, Chuck Schumer, “I’m closer to Trump than Obama on Trade with China,” <https://www.washingtonexaminer.com/news/chuck-schumer-im-closer-to-trump-than-obama-on-trade-with-china>.

(二) 特朗普政府全面实施“印太”战略

美国认为,中国的行为是想要在东亚取得优势并削弱美国在该地区的地位。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中国要在亚太地区建立一个包含经济联系机制、基础设施、规则协调、多边协商机构等在内的区域性国际体系;中国试图使这个区域性体系在最大程度上独立于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希望使自己扮演中心角色,把美国排挤到边缘位置。日本政治分析人士、新加坡国立大学国际关系客座教授寺田贵认为,中国关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的倡议正是致力于实现这一目标。^①中国提出上述方案,是推动东亚地区一体化的重要举措,也是对冲早先美国奥巴马政府提出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的举措。奥巴马政府曾经力推 TPP,将其视为平衡中国地缘经济在亚太地区扩张的重要工具,但特朗普上任第三天,即签署了美国退出 TPP 的命令,尽管许多美国执政精英,包括美国国会的一些议员,都认为特朗普退出 TPP 协议的决定是错误的。与美国一度主导的 TPP 不同,RCEP 由中国力推,它更多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计划在亚太地区达成有更高水平贸易自由化的制度安排。据寺田贵的看法,“中国利用自己擅长使用经济影响力和自身的对外经济政策来改造本地区的经济秩序以符合自己的政治和战略利益”。^②

在废弃了奥巴马关于亚太地缘经济整合的 TPP 之后,特朗普政府继承并发展了奥巴马政府后期设想并推出的“印太”概念,这一概念旨在从更大的地缘空间内联合民主国家的力量防范中国。它设想以美国为核心,联合澳大利亚、日本和印度来共同维持地区现状,以回应中国的快速崛起。这一概念的突出特色即是把印度纳入平衡中国的地区力量框架之内,更多地借助印度的力量牵制中国。虽然中国官方对于美国“印太”概念的提出没有做出正式反应,可是中国政治分析人士对这个问题的分析非常引人注目。一些人认为,这一地缘政治设想是过于模糊的概念,无法对它进行具体直观的评判。另一些人则认为,它是前总统奥巴马提出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在地理上的延续。一些政治分析人士将这一概

① Takashi Terada, “The Competing U. S. and Chinese Models for an East Asian Economic Order,” *Asia Policy*, April 2018, vol. 13, no. 2, p. 20.

② Takashi Terada, “The Competing U. S. and Chinese Models for an East Asian Economic Order,” *Asia Policy*, April 2018, vol. 13, no. 2, p. 23.

念视为美国推行的遏制中国全球战略的地区性回应。

但是，特朗普政府确实已将“印太”设想从概念上升到战略上，2019年6月，美国国防部发布了《2019年印太战略报告》，这是美国发布的第一份印太战略报告。该报告声明了美国通过做好准备、建立伙伴关系和促进区域网络化，实现对该地区稳定和繁荣的持久承诺。^①美国实施印太战略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基于竞争性或排斥性的目的，试图提供一个不同于中国在该地区发起的“一带一路”倡议的地缘经济备选方案。在2018年11月的APEC工商领导人会议上，美国副总统彭斯透露，在过去两年，美国公司在印太地区国家实施了超过1500个新项目和610多亿美元的投资。美国在该地区的投资总额已达1.4万亿美元，超过了中国、日本和韩国的总和。^②

总之，从2018年中期以来，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使中美关系进入到一个全方位的战略竞争阶段，中美战略竞争的激烈程度明显加剧，且具有全面性、长期性的特点。

二 中国在跨大西洋联盟讨论议题领域中的地位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在对华政策实践的历史上习惯于依靠亚太地区盟国——日本、韩国以及澳大利亚。与在欧洲建立的集体安全机制不同，美国在亚太地区依靠一系列双边同盟来建设区域安全架构，通过离岸平衡和灵活反应来参与亚太事务。这种机制设计符合亚太国家间关系复杂、文化多元的实际，能够有效维护美国的霸权。但中国实力的空前壮大逐渐颠覆了美国的传统观念和地缘政治结构。越来越多的美国政治家和学者倾向于认为，中国的崛起有可能是美国自建国以来面临的最严峻挑战，而且这一挑战的规模如此之大，以至于不仅美国，而且包括欧洲在内的整个西方都需要对这一全球力量格局变迁做出全面回应。

中国的迅速发展迫使美国政界和学界要根据新的方式评估日益迫近的变化。

① “Indo-Pacific Strategy Report,” <https://media.defense.gov/2019/Jul/01/2002152311/-1/-1/1/DEPARTMENT-OF-DEFENSE-INDO-PACIFIC-STRATEGY-REPORT-2019.PDF>.

② “Remarks by Vice President Pence at the 2018 APEC CEO Summit,”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remarks-vice-president-pence-2018-apec-ceo-summit-port-moresby-papua-new-guinea/>.

正如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斯蒂芬妮·西格尔(Stephanie Segal)在国会听证会所言,1980年中国经济的总体规模几乎只是美国的1/10,但21世纪初期它已接近美国的1/3,在2017年更是超过了2/3,力量对比变化的趋势很明显。西格尔还认为,中国将继续以高于美国的速度发展。可以预见,中国的GDP总量将会在一代人的时间内超过美国。美国应该认真对待中国经济规模的扩张,因为经济实力增强会使中国政府投入大量资源以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①一些美国政治分析人士认为,实力增强的中国将发起全球挑战,否定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而这是西方在现代国际关系中保持优势地位的基础,西方必须加强协调以平衡中国潜在力量的增长。

中国在跨大西洋联盟的议题讨论中的作用比较微妙,它表现出原则上重要和现实中乏力的特点,重对话轻协调、重呼吁轻落实。一方面,美欧都承认,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不断增强,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对华关系十分重要。亚太安全问题,不能认为与中国毫无关系,也不能认为亚太安全在跨大西洋联盟的议事日程中只占有微不足道的地位。在2016年6月发表的《欧盟对华新战略要素》文件中,欧盟承认对华政策必须被置于更宽广的亚太区域背景之中,美欧协调应该增强。^②据统计,世界上40%—50%的贸易运输要经过南中国海,但这里的地缘政治紧张程度却在上升。一旦美中矛盾演变为军事冲突,就会构成对国际市场和穿越该区域供应通道的现实威胁。因而,美国和欧盟高层在会晤时,关于亚洲地区安全话题的讨论带有不定期的和偶尔的特点,通常是在该地区出现了危机局势的时候才会进行。

如果说美欧之间在工作事务层面上偶尔会就亚太局势进行对话,双方在政策层面的协调和联合计划实际上是缺乏的。例如,华盛顿曾经不止一次警告欧盟违反武器禁运承诺出售武器给中国;对于欧洲在给中国提供军民两用技术领域的出口管制制度的无效性,华盛顿也表达过不满。但美国在这方面对欧洲盟国的影响显得乏力,欧洲并没有感觉到来自中国的安全威胁。欧盟在2016年通过了“共同愿景、共同行动:一个更强大的欧洲”的外交与安全政策全球战略,承认

① Stephanie Segal, "Multilateral Economic Institutions and U.S. Foreign Policy," https://www.foreign.senate.gov/imo/media/doc/112718_Segal_Testimony.pdf.

② "Elements for a new EU strategy on China," p. 5, https://eeas.europa.eu/sites/eeas/files/joint_communication_to_the_european_parliament_and_the_council_-_elements_for_a_new_eu_strategy_on_china.pdf.

“在欧洲的繁荣与亚洲的安全之间存在直接的联系”。^① 这个文件清晰地表达了欧盟要在亚洲安全问题上发挥更积极作用的意愿,^② 但在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费代丽卡·莫盖里尼 (Federica Mogherini) 给欧洲委员会和欧洲议会的定期报告中实际上并没有谈到任何具体问题, 无论是关于亚太安全的关键问题, 还是关于欧洲准备采取要解决这些问题的具体步骤。欧盟领导层更愿意回避与华盛顿在亚太地区的分歧及矛盾, 特别是在中国问题上。实际上, 欧洲国家中对于如何应对亚太地区局势, 特别是涉及中国的议题, 也缺乏统一的意见。

欧洲国家主要关注同中国发展经济贸易关系。中国是欧洲的重要市场和主要贸易伙伴, 双方经济的互补性很强。在自身经济增长乏力、面临危机不断、英国脱欧的境遇下, 与中国开展更密切的经济合作对于欧洲十分重要。与此同时, 欧洲国家也认识到, 在维护非洲和平、中东稳定、裁军、核不扩散、网络空间等国际安全问题上, 在全球治理的某些问题上, 诸如维护有效多边主义、应对气候变化、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等问题上, 中国与欧洲具有共同利益。^③ 此外, 欧洲一直视自身为国际关系中一支“规范性力量”, 坚持多极化的国际秩序主张, 坚持多边主义, 反对单边主义, 希望在国际舞台上发挥自身的影响力, 而这都离不开中国的支持。事实上, 中国也认为“欧盟是国际格局中一支重要战略性力量”。^④ 在某种程度上, 中欧之间拥有的广泛共同利益决定了中国是欧洲抗衡美国可以联合的伙伴。2019年3月, 欧洲委员会及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莫盖里尼

① European Union, Shared Vision, “Common Action: A Stronger Europe, A Global Strategy for the European Union’s Foreign and Security,” http://eeas.europa.eu/archives/docs/top_stories/pdf/eugs_review_web.pdf.

② 费代丽卡·莫盖里尼2014年11月正式就任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 她在2015年年初便提出, 欧盟应该制定一个“新战略”, 从而更有效地帮助欧盟制定政策, 辨析优先议题, 系统地运用各种政策工具服务于自身目标, 并为遴选合作伙伴提供新的方向。经过一年多的意见征询与政策磋商, 欧盟于2016年6月发布全球战略新报告《共有愿景、共同行动: 一个更强大的欧洲》, 该报告致力于制定“一致”“全面”且“共同”的全球战略, 特别强调地区性动力在国际秩序与地区秩序构建上的重要性, 并分别探讨了欧盟在推动世界范围内“合作性地区秩序”中可以扮演的显著角色。参见 Federica Mogherini, “Preface, Toward an EU Global Strategy: Background, Process, References,” https://www.iss.europa.eu/sites/default/files/EUISSFiles/Towards_an_EU_Global_Strategy_0_0.pdf, pp. 5-6; European Union, Shared Vision, Common Action: A Stronger Europe, pp. 32-39.

③ “Elements for a New EU Strategy on China,” pp. 10-16, https://eeas.europa.eu/sites/eeas/files/joint_communication_to_the_european_parliament_and_the_council_-_elements_for_a_new_eu_strategy_on_china.pdf.

④ 《中国对欧盟政策文件》,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8-12/18/c_1123868707.htm.

发表了一份名为《欧中战略前景》的文件,以评估欧盟与中国关系的前景,该文件虽然称中国是欧盟的“经济竞争者”和“全面系统的对手”,批评中国的南海政策,但在具体行动上只是建议欧洲在和平和安全问题上与中国加深接触,共同维护伊核协议的有效性。^①

在特朗普入主白宫的前两年,亚洲安全话题一般不会进入美欧高层的对话内容,其原因在于华盛顿怀疑在亚太事务问题上同欧洲有效合作的可能性。更何况自特朗普当选以来,致力于这种合作的前提条件还在减少。美国政府更多关注美国利益,提出了“美国优先”口号,这在很大程度上挫伤了其欧洲盟友的积极性,欧洲关注跨大西洋联盟在世界政治复杂问题的谈判协商上的意愿有所减弱。

但是,华盛顿呼吁欧洲同自己协调立场以讨论中国在东海和南海的“地区扩张”,就中国在与一些邻国存在争议的岛礁上建设人工岛屿发出共同声音。特朗普政府并未能争取到以北约或者美欧双边发声的方式实现这一目标。但是,2017年5月在意大利陶尔米纳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特朗普政府在上述问题上得到了主要欧洲大国的外交支持。这次会议通过了并不承担实际义务的政治声明,峰会通过的最后公报对中国东海和南海的局势表示关注,并“强烈反对单方面增加紧张的行为”。^②结果引起中国外交部的激烈反应。

北约是跨大西洋联盟进行安全合作的主要平台。多年来,中国和北约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没有多大进展,只是在2009年之后双方关系才有所发展。根据布鲁塞尔倡议,当年中国和北约的军方领导人之间开始建立直接接触。从2010年起,双方军事代表团在工作层面上开始举行年度互访,中国军事和外交人员以短期培训的方式访问北约,而北约盟国的代表团也造访中国。中国和北约还合作打击亚丁湾和索马里沿海海盗。2015年11月在该海域举行的联合军事训练中,有中国和北约的舰艇共同参与。

2011年4月,北约外长会议通过《在安全问题上基于合作的积极协同行动:伙伴的更有效和更灵活政策》文件,宣布要以开放态度对待与欧洲一大西洋地

① “EU-China-A strategic outlook,” pp.3 - 4,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sites/beta-political/files/communication-eu-china-a-strategic-outlook.pdf>.

② “G7 Taormina Leaders’ Communiqué,” http://www.g7italy.it/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G7%20Taormina%20Leaders%27%20Communique_27052017_0/index.pdf.

区之外关键大国的联合行动，其中包括中国，但是关于这类配合的决定应该根据每次合作的具体情况得到联盟政治高层的同意。^① 亚太地区的主要国家——澳大利亚、韩国、日本都同北约签署过关于在军事—政治问题上的伙伴协议，包括在调解危机时的相互配合。但是，布鲁塞尔与堪培拉、首尔和东京建立联系并不能让中国放弃冷淡态度，中国尚未同北约和欧盟在安全领域建立起机制性联系。总体而言，由于北约和欧盟在关于东亚地区安全问题上扮演着不太明显的角色，欧洲也意识到“倾向于巩固同美国地区盟国的战略关系将损害到中国的利益”，^② 但也没有与中国建立制度化联系的迫切要求。

在特朗普政府的推动下，北约对中国和亚太事务的关注逐渐增多。2019年8月，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访问澳大利亚期间，代表北约与澳大利亚签署了一份新的伙伴关系协议，表示“有必要”在亚太地区部署军事力量，以对抗“中国的崛起”。^③ 2019年12月4日，为庆祝北约成立70周年而举行的领导人峰会签署了一份联合声明，承认中国崛起构成“机遇和挑战”。此外还将批准一份内部报告，就北约应如何处理对华关系草拟一份行动计划。^④

中国对北约的态度很明确，中国认为北约是冷战的产物和残余，是作为自己主要竞争对手的美国领导的军事政治集团，是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的基石之一。北约的存在妨碍着中国地缘政治利益的广泛展开。例如，中国从中东地区大量进口石油，北约在近东地区的军事存在威胁到中国的能源安全；中国在国际军火市场上参与竞争，但潜在买家要购买中国的防御性武器时就会受到北约的压力，北约就曾禁止土耳其从中国购买武器和军事技术。中国也坚决反对北约东扩，因为北约越靠近俄罗斯就意味着其军事设施越靠近中国边界。对于北约要把蒙古纳入联盟伙伴的范畴，中国政府表示担忧，这一步骤将增加西方国家靠近中国边境进行军事训练的可能性。

中国对北约也保持着警惕心理。中国不能无视北约在事关自身战略利益的重

① “Active Engagement in Cooperative Security: A More Efficient and Flexible Partnership Policy,” https://www.nato.int/nato_static/assets/pdf/pdf_2011_04/20110415_110415-Partnership-Policy.pdf.

② Luis Simon, “Europe, the Rise of Asia and the Future of the Transatlantic Relationship,” *International Affairs*, September 2015, vol. 91, no. 5, p. 987.

③ “Remarks by NATO Secretary General Jens Stoltenberg at the Lowy Institute (Sydney),” 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opinions_168351.htm.

④ “London Declaration,” 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official_texts_171584.htm?selected-Locale=en.

要地区的存在和活动。北约军队，主要是美军在阿富汗的存在无疑影响到中国利益。2014 年 12 月，北约正式宣布，驻阿富汗国际安全援助部队正式结束在阿的战斗任务，代号为“坚定支持”的北约在阿富汗非作战使命于 2015 年 1 月 1 日启动，其主要任务是为阿富汗安全部队提供培训、咨询和协助。2015 年 12 月，北约外长会议决定 2016 年将继续执行代号为“坚定支持”的北约在阿富汗非作战使命，同时继续为阿富汗安全部队提供援助。中国认为阿富汗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环节之一，开始积极参与阿富汗和平进程，试图从外交上寻求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之间的和解，支持巴基斯坦在谈判进程中的调解努力。此外，一些北约盟国表现活跃的地区，虽然北约本身没有公开参与，例如叙利亚和近东许多其他国家，也关系到中国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利益存在，影响到“一带一路”建设的顺利推进。

三 美欧跨大西洋联盟关系中的中国 因素和亚太地区安全问题

中国的发展壮大不同于北约以往遇到过的任何一类挑战。北约国家在评价这个进程方面表现出很大的意见分歧。对美国而言，中国迅速崛起被美国政治精英视为不断增长的威胁，对美国主导的西方在全球力量对比中占据的优势地位和享有的利益构成了严重挑战。例如，中国现在已经取代美国在一系列全球发展议题——从国际贸易到应对气候变化上扮演世界领袖的角色。欧洲盟国的看法则不同，它们认为中国崛起多半不是一种挑战，也不是对自身安全的军事威胁，反而提供了一种与世界大国发展关系时实现新的经济可能性的前景，虽然在一些情况下欧洲为争夺第三方市场与中国存在利益竞争和冲突。总体而言，欧洲盟国与中国之间不存在产生直接政治冲突的客观前提，它们不愿意看到相互关系陷于军事竞争的境地。

中国崛起对西方世界构成了严重和多方面的挑战，无疑，这种挑战必然存在于北约战略家的评估之中。但在联盟的官方层面，对这个问题往往是故意不说，甚至很少公开讨论这个话题。如果说中国崛起问题较为抽象不易讨论，那么在现实议题中，美国和欧洲盟国一般也会回避讨论与中国相互关系的话题，而主要原因并非地理阻隔。亚太地区与欧洲—大西洋地区确实在地理上相距遥远，但这并

不能发挥决定性作用，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同样处在北约的行动范围之外，北约却在这里采取了军事行动。实际上主要原因还是美国和欧洲盟友之间在看法上存在重大分歧，联盟内部对中国因素以及多少亚太地区安全问题是由中国因素引起的缺少共识。西方分析人士甚至假设有一种可能性，即“中国崛起导致跨大西洋联盟的破裂”^①。跨大西洋联盟既没有在台湾问题，也没有在东海钓鱼岛和南海一系列岛屿及岛礁的领土纠纷上进行过协调。联盟成员宁愿回避讨论不合适的问题，尽管实际上在亚太地区没有任何一个严重的安全问题完全与中国无关。

亚太安全问题虽然没有被列入北约的议题范畴内，但北约并没有忽视这个地区。北约最初是通过“联系国机制”与亚太国家发展关系。“联系国”并不是北约成员国，也不是1994年建立的“地中海对话机制”和2004年建立的“伊斯坦布尔合作倡议”成员国。在2004年6月的伊斯坦布尔峰会上，北约表示，欢迎与一些国家以“联系国”的方式与北约在安全领域开展一对一的、互利的对话，愿意加强与澳大利亚的合作。^② 2006年4月，北约外长会议开始讨论与北约传统防务区域之外的享有共同价值观的“联系国”建立更密切的关系。^③ 在2006年11月的里加峰会上，美国和英国虽然提出了“北约全球伙伴计划”，但并未被其他国家接受，也未体现在《里加首脑会议声明》中，但在声明中提出要进一步推进现存的与“联系国”的各种合作项目，发展双边关系，提高北约提供建议和援助的能力，并基于包容、透明和自我区别的原则开展灵活的磋商。^④ 在2008年4月的布加勒斯特峰会上，北约对澳大利亚、日本、新西兰、新加坡、韩国等国对北约在阿富汗行动的支持表示感谢，重申愿意与“联系国”进一步发展现存关系，并保持对建立新的个性化的联系的开放性。^⑤ 2010年11月，在里斯本峰会上，北约提出新战略概念和增强北约的伙伴关系议题，合作安全与集体安全、危机管理被列为北约的三大核心任务。2011年4月，北约正式推出“新伙伴政策”，这为北约培育对于落实新战略概念至关重要的合作安全提

① Bechná Zinaida, Thayer Bradley A., “NATO’s New Role: The Alliance’s Response to a Rising China,”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Summer 2016, vol. 69, no. 3, p. 66.

② “Istanbul Summit Communiqué,” <https://www.nato.int/docu/pr/2004/pr04-096e.htm>.

③ “NATO’s Partnerships,” p. 9, <https://www.nato.int/docu/comm/2006/0611-riga/presskit.pdf>.

④ “Riga Summit Declaration,” <https://www.nato.int/docu/pr/2006/p06-150e.htm>.

⑤ “Bucharest Summit Declaration,” https://www.nato.int/cps/en/natolive/official_texts_8443.htm.

供了一系列新的工具,也为潜在和现实的合作伙伴塑造与北约的关系提供了机遇。^①2012 年 5 月,芝加哥峰会进一步强调了北约的伙伴关系对于合作安全的重要性,北约的新伙伴关系政策成为北约最为重要的任务之一,北约还邀请了 13 个伙伴国参加了芝加哥峰会。在新伙伴政策下,所有与北约存在单独合作项目的国家都能够接触到一份新的“伙伴关系合作菜单”,这包括了多达 1600 余个项目。这项政策实施以后,巴基斯坦、伊拉克、阿富汗和蒙古也成为北约官网上列出的伙伴国。^②

北约与亚太地区国家的合作涉及军事培训、交换情报、安全控制和打击海盗等方面。一些早期的合作扩展到美国领导的国际联盟在阿富汗的协调行动,尽管这种合作没有导致建立起北约—亚太地区的协调行动联合机制,可是在“伙伴国”的政策框架内,北约在几年前就签署了在军事领域与主要地区国家——澳大利亚、日本和韩国合作的协议。

北约还没有制定过针对亚太地区的战略。在亚太地区安全问题上,一方面,欧洲盟国缺乏应有的能力参与亚太安全事务。考虑到中国军事力量的规模,正如比利时政治分析人士西蒙·路易斯(Simon Luis)所指出的,美国官方人士“对于欧洲盟国可能要投入到亚太地区高度紧张的军事冲突的场景持有非常怀疑的情绪”。^③欧洲盟国里只有英国和法国在亚太地区拥有潜在投放力量(虽然比较克制)和政治外交资源,它们在太平洋有不多的舰艇和一些海军供给站,但这是极为有限的军事存在。美国更习惯于借助当地盟国和伙伴的帮助,因为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拥有超过欧洲国家的军事力量。另一方面,欧洲盟国也缺乏过度参与亚太安全事务的意愿,它们不想卷入到美国和中国可能发生的冲突当中。但是美国的观念正在发生变化,根据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的看法,华盛顿应该敦促北约盟国加强与亚太地区国家的对话和开展协调行动,“这样行动,美国将把自

① Rebecca R. Moore, “Lisbon and the Evolution of NATO’s New Partnership Policy,” *Perceptions*, Spring 2012, vol. XVII, no. 1, pp. 55–74.

② “Arif BAĞBAŞLIOĞLU, Relations With ‘Global Partners’ in the Framework of NATO’s New Partnership Policy,” *Security Strategies Journal*, vol. 10, issue 20, October 2014, pp. 49–83.

③ Simon Luis, “Europe, the Rise of Asia and the Future of the Transatlantic Relationship,” *International Affairs*, September 2015, vol. 91, no. 5, p. 984.

己的大西洋盟国吸引到亚太地区战略问题上，并且以多种方式应对本地区出现的复杂问题”。^①

欧洲盟国对于参与亚太安全事务的意愿差异较大。一些欧洲强国，如英国和法国，对亚太地区安全问题的兴趣更大。伦敦和巴黎同东京在安全领域里建立了“2+2”双边对话机制，^② 它们也参加在新加坡举行的一年一度的“香格里拉对话会”，这是亚太地区少有的各国都能参与的安全对话平台。美国的许多盟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丹麦、荷兰和挪威都参加了在太平洋举行的海上军事演习。一些北约盟国希望将在波罗的海和北大西洋开展的保护海上交通、实施水上防御对抗和空中防御对抗的训练所获得的经验复制到西方国家在太平洋地区使用武力遏制中国的行动中。另外一些欧洲国家，特别是波兰、波罗的海三国则更关注欧洲自身的安全问题，将俄罗斯视为北约面临的主要威胁，而东南欧国家则视中国为发展的机遇。西欧与东欧、欧洲的传统强国和较弱小的国家对北约的主要防务方向和安全议题的理解并不相同。

针对美国军舰在南海有争议的岛屿和岛礁附近开展示威性航行，一些欧洲盟国也表态要效法这一做法以维护航行自由原则。在2016年6月举行的第15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活动中，时任法国国防部长让-伊夫勒·德里安（Jean-Yves Le Drian）提议，希望欧洲国家的军舰基于协调原则在南中国海和亚洲其他海域开展可以看得见的巡逻任务。当前，法国、英国和荷兰的舰艇以维护南海地区的航行自由为由在南海水域进行了巡航，但它们是在单独行动而非同北约捆绑在一起的情况下实施的。香格里拉对话主办方、国际战略研究所亚洲执行董事蒂姆·赫胥黎（Tim Huxley）和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国防安全和犯罪研究系主任本·史瑞尔（Benjamin Schreer）认为，美国不仅能够召唤澳大利亚和日本，而且还有自己的欧洲盟国，特别是英国和法国，在南海的中国人工岛屿周围12海里内实施海上行动以捍卫自由航行原则。^③

与此同时，北约作为一个组织本身回避派遣海军代表团前往亚太地区。法

① B. Scowcroft, “The Atlantic Alliance Transformed,” http://www.acus.org/new_atlanticist/atlantic-alliance-transformed.

② 2018年7月，日本和欧盟领导人签署了日本—欧盟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该协定不仅涉及削减关税，消除非关税壁垒，更重在制定国际经济规则。2018年12月，欧洲议会通过了该协定。2019年2月1日，该协议正式生效。

③ Tim Huxley, Benjamin Schreer, “Trump’s Missing Asia Strategy,” *Survival*, May 2017, vol. 59, no. 3, p. 86.

国关于派遣打着欧盟旗号的类似代表团或者将欧洲国家舰艇纳入它在太平洋行动舰艇编队的建议没有获得伙伴国的支持。一些西方专家建议欧洲盟国军舰基于协调原则航行通过该地区海洋的有争议区段,并且与亚太地区的伙伴国开展联合海上军事演习。毫无疑问,实施类似建议得到了特朗普政府的赞同,但在欧盟的政治高层,这些想法没有得到支持,因为欧洲珍惜自己同中国的关系,不愿意同中国发生对抗。此外,欧洲盟国也避免干涉南海相关岛屿的领土争端。

除了认为中国在南海地区的主权声索是挑战外,美国还认为“一带一路”是中国的地缘经济工具。美国认为,中国正在利用经济手段,破坏一些国家的主权,中国提供的资金附带有不可持续的债务、透明度下降、限制市场经济以及可能失去对自然资源的控制等限制条件。^① 美国担心欧洲盟国容易受到经济实力不断增长的中国的伤害,担心中国借助“一带一路”把北约成员中的弱小国家纳入自身影响的轨道上。据一些西方专家的看法,在中国地缘经济工具的影响力下显得特别脆弱敏感的,是那些因金融问题负担沉重的西方国家,如希腊、西班牙、意大利和一些东欧国家。意大利、希腊、捷克、匈牙利已经同中国签署了关于共建“一带一路”的协议,而北约的其他成员国也有可能之后参与这项倡议。据一些美国专家评估,包括黑山在内的八个国家获得了中国的贷款,可能会成为中国的债务国,因为提供这些贷款的条件是不透明的。某些西方观察家甚至宣称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为经济上弱小的伙伴国设置的“债务陷阱”。

美国认为,中国借助金融—经济杠杆在欧洲个别国家施加影响力,能够冻结在欧洲层面通过一些触犯自己利益的决议。例如,由于一些成员立场的缘故,欧盟没有通过支持2016年7月联合国国际海洋法庭判决的声明,该判决完全否认中国对南海一系列岛礁所宣称的权利,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2017年关于新疆维吾尔穆斯林权利的声明中。北约成员国中的意大利、匈牙利、希腊、捷克和黑山都是中国信贷和投资的接受者,除黑山外,其他四国也是欧盟成员国。它们曾经在欧盟层面否决了对中国不利的声明,自然也可能在北约内部否决不利于中国的

① “Statement of Admiral Philip S. Davidson, U. S. Navy Commander, U. S. Indo-Pacific Command before the Senate Armed Services Committee On U. S. Indo-Pacific Command Posture,” https://www.armed-services.senate.gov/imo/media/doc/Davidson_02-12-19.pdf.

决议和行动。

欧洲盟国在是否应该就中国和亚太地区安全问题同华盛顿进行政策协调，以及如果需要的话，那么应该在何种程度上进行协调等问题上依然存在分歧。英国历来致力于加强同美国及它们的地区伙伴的合作，并准备支持华盛顿在军事—政治上同北京的对抗。德国和法国采取更为灵活的立场，不愿承担义务，更倾向于扩大同中国的经济贸易关系，因为中国市场对于它们的经济而言具有重大意义。南欧和东南欧的意大利、希腊等国并不认为中国是自己的外部威胁，对它们而言，在承担北约的安全义务时不应把“中国话题”想象成紧迫问题。东欧国家也反对北约卷入同中国的对抗，不赞成同亚太地区国家建立同盟关系，因为担心这些行为会涉及对《北大西洋条约》第5条和第6条的传统解释，即联盟集体防务要保障欧洲安全。^① 北约拓展范围可能从中抽走资源。

欧洲盟国欢迎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降温，也欢迎亚太地区国际局势的积极变化，例如，它们欢迎朝鲜半岛南北双方缓和关系取得明显进展。欧洲不同于美国，在亚太地区没有军事政治利益。特朗普总统上台以来，倾向于把与盟国的关系看成是交易，而且常常把商业利益放在第一位，再加上他做决定的不可预测性，所有这些并不能促进欧洲国家在美国对华政策的旗帜下的协调与团结，反而使中国有可能防止在北约形成针对中国的协议，防止在美国战略中利用地缘政治联盟围困中国的图谋。

中美博弈是一个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博弈，欧洲已经成为中美争夺的重要区域。正如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范亚伦（Aaron L. Friedberg）的评价，“美国和中国之间外交竞争的规模不会局限于亚洲。中国现在试图利用自己持续增长的经济影响力（美国政策方针的不确定性）加剧欧洲内部的分歧，同样的策略也会应用到美欧关系上。美国应该投入更多努力以动员欧洲盟国的支持从而在亚洲实现共同的目标。”根据范亚伦的看法，现在这样做要比几年以后再更容易，因为“许多欧洲政府现在同意美国对于中国在许多领域的政策方向表现出的担忧”。^②

① “The North Atlantic Treaty,” 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official_texts_17120.htm.

② Aaron L. Friedberg, “Competing with China,” *Survival*, June - July, 2018, vol. 60. no. 3, p. 32.

四 跨大西洋联盟针对中国因素的协调 意愿在增强还是在减弱?

从法律层面来看,跨大西洋联盟并不具备针对中国因素开展协调的支持条件。1949 年 4 月签订的《北大西洋条约》是北约存在的法律基础,但它并没有赋予美国这样的法律依据,即在太平洋或者世界其他地区与中国可能发生的军事冲突中期待获得欧洲盟国的军事支持,条约中对北约的防务区域有明确规定——欧洲、地中海和北大西洋。^①但华盛顿的根据是,至少在亚太地区用非强力手段解决危机时,欧洲人应该站在自己一边。正如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达尼尔·R. 拉瑟尔在 2014 年的一次会议上所言,由于美国在乌克兰局势问题上与欧洲表现出团结精神,那么欧洲在亚洲的重要安全问题上也应该与美国团结一致。

在美国看来,不与美国团结一致就是不尽职的表现,这具有不利的后果,特别是在特朗普总统一直指责北约盟国承担欧洲防务开支不力的时候,这种做法一定会给特朗普总统及其政策支持者关于跨大西洋团结精神的价值对美国是在不断贬值的说法提供新的理由。无论如何,在跨大西洋联盟的防务问题上,欧洲还没有足够的自主权,局面也不是由单方面塑造的。2017 年 8 月,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接受《商业》报纸发行人施泰因戈尔特采访时表示,在美国与朝鲜发生军事冲突时,德国不会无原则地支持美国,因为不是所有调解危机的外交可能性都已用尽。^②类似的表态说明德国并不信任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但是这种表态未必能够得到华盛顿的理解,即便德国没有破坏自己承担的北约盟国义务。

德国就朝鲜局势向美国解释联盟义务的首要原因,是这个地区对于维护欧洲安全的根本利益并不具有决定性意义。这种解释肯定可以被看作德国忠于《北大西洋条约》第 5 条的传统解释,可是这种解释的“狭隘性”未必能够安抚美国。随着新的全球性挑战和威胁的出现,挑战常常带有非对称和网络状的特点(如国际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要认真思考关于“集体防务”概念的边界。原条约第 5 条在联盟内部的解释应更灵活、范围更广。如西方作为

① NATO Manual, Office of Information and Press, Brussel, 2001, p. 671.

② Merkel, Uncut, Handelsblatt Interview, <https://global.handelsblatt.com/politics/merkel-ancut-817724>.

在“乌克兰危机”之后提出的“来自俄罗斯的混合威胁”的概念就为这种讨论提供了新的案例。

德国的谨慎行为还源自冷战后北约军事行动地理范围扩大的趋势。冷战结束后，由于当时内部发生的争论，北约得出结论认为，为了保持生命力北约应该在条约规定的传统责任区以外扩大自己可能的军事行动界限。北约开始寻求转型，在1999年进行了第一轮东扩，并变得更像是一个政治俱乐部，而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军事同盟。在“9·11”事件之后，反恐成为北约的一个防务目标，尽管它可能更适合维持地区和平而不是承担反恐责任。^① 北约先后在阿富汗、伊拉克和利比亚发起了军事行动，这些行动最终酿成了2015年的难民危机，给欧洲带来了巨大冲击。由于华盛顿把朝鲜发展导弹和核武器列为对美国国家安全最危险的威胁范畴，一旦在这个区域发生军事冲突而缺少德国或者任何其他盟国的支持，将对欧洲在亚太地区的利益和跨大西洋联盟关系构成巨大冲击。

实际上，北约论证自己扩大防务范围的合理性的努力一直在继续。早在2010年3月，时任北约秘书长拉斯姆森在提交论证北约战略的预备方案时直接表示：“在当代世界为了捍卫我们的原则，我们可能应该要超出我们边界。”^② 他还以阿富汗为例论证了这一点。该方案在同年年底的里斯本峰会上得到批准。拉斯姆森关于支持北约在集团的条约责任区之外采取主动行动的建议是由一些西方智库提出的，特别是由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领导的高级研究中心。他们在为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准备的一份报告中说，“北约应该保持足够的灵活和效率，为的是在远离自己边界的地方行动”^③。但是，北约未必有能力扮演一种独立的角色去应对中国，特别是当考虑到在北约内部通过决议存在分歧，而许多欧洲国家极力想同中国保持伙伴关系时。

北约确实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不应该把欧洲盟国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的角色绝对化，美国对于北约的使用很灵活。一方面，美国因这样或者那样的理由能够给予一个同自己没有同盟义务关系的国家以军事支持。

① Manuela Paraipan, “A New Role for NATO,” <http://www.worldsecuritynetwork.com/NATO/manuela-paraipan/A-New-Role-for-NATO>.

② S. Erlanger, “NATO Urged to Look Beyond Borders,” <https://www.nytimes.com/2010/05/18/world/Europe/18nato.html>.

③ NATO 2020, “Assured Security; Dynamic Engagement,” https://www.nato.int/cps/en/natolive/official_texts_63654.htm.

另一方面,正如美国政治学家布赫尔·兰德斯(Hal Brands)和彼得·D.费维尔(Peter D. Feaver)的看法,美国为捍卫自己的利益在世界的关键地缘政治地区——欧洲、东亚和近东开展军事行动,即便同当地国家没有正式的联盟关系,因为不能让任何敌对国家在这些地区建立起自己的优势。^① 北约与许多同美国没有军事同盟关系的国家开展过务实合作,例如,瑞典和芬兰是形式上的中立国,但在防务领域与北约进行紧密配合,从军事角度看它们已经与北约成员国没有多少差别了。它们与美国和北约开展更为积极和更大规模的合作,包括在联盟的各种合作框架内,甚至要超过那些希望成为北约成员或者是已经成为正式“联系国”的某些国家。^②

从表面上看,亚太地区远离欧洲,欧洲盟国没有必要为距离自己边界数千公里之外的局势感到不安。但是亚太安全问题早已进入北约的视野,这有三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北约活动区域扩大的长期趋势。在冷战结束后,北约不再将自己的行动区域局限于欧洲大西洋地区,21 世纪初其在阿富汗等地的几场军事行动就是明显的证据。其次,地区之间逐渐接近的客观趋势。全球化、经济和基础设施项目的跨地区一体化以及新的交流技术的出现(包括全球“互联网”的前景),政治一意识形态和信息网络结构的普及使得“遥远地区”的概念显得非常有限,这些现象和进程愈加使得地区相互之间更加接近,极大地加强了它们的相互依存度。最后,新兴强国崛起实施的战略选择。这个最典型的案例就是中国,它实施向西进行洲际扩展,通过中亚和南亚向近东、经过高加索向东南欧扩展。“一带一路”倡议通过建设从中国到欧洲的穿越不同地区的交通网,建立穿越亚欧大陆的基础设施,可以使中国在传统交通线之外获得通向外部市场的出口。一旦同美国在东亚发生军事冲突,它们能够成为中国获得必要原料和进行对外贸易的战略通道。中国希望最大限度地使本国与世界市场的交通联系多样化,以保障自己地缘政治和经济地位的稳定性。^③ 这一选择是中国成长为全球性强国的必然要求,是中国拓展自身战略空间的必然选择。但这也对外部世界带来了挑战,使

① Hal Brands, Peter D. Feaver, “What Are America’s Alliances Good For?” *Parameters*, Summer 2017, vol. 47, no. 2, pp. 17–18.

② О. В. Приходько, США и Политика партнерства НАТО, США & Канада: экономика, политика, культура, № 3, 2013, сс. 37–52.

③ Л. Б. Вардомский, Торговые связи с КНР 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развитие Российских регионов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 6, 2018, с. 75.

与中国因素关联的亚太安全问题逐渐全球化，这不能不使欧洲国家做出必要的反应。

虽然欧洲大国出于全球力量平衡的战略考虑，不赞同美国对待中国的做法和对亚太地区局势的评估，但美国还是竭力影响它们的行动，强调在北约框架内的安全与义务不可分割，尽管美国更多地关注自己的安全利益，对欧洲的安全不甚考虑。如果一旦美国和中国之间发生冲突，欧洲盟国会面临许多困难问题。例如，希腊债务危机发生时中国公司为它提供大量投资，希腊也接受了大量中国投资，如果华盛顿在危急形势下要求它收回中国公司对希腊港口比雷埃夫斯港的管理权限，希腊就会陷入困境。

因此，从实际层面来看，一旦中国在亚太地区与美国出现了军事冲突，欧洲盟国未必能够袖手旁观，因为它们同美国有集体防务的义务，即便是北约活动的法定行动空间并不包含这个区域。欧洲盟国的冷漠和不参与会被美国视为不尽职，这将使欧洲盟国承受来自美国的巨大压力。但是欧洲盟国参与的程度则要视国别而异，它们也缺乏持久的参与意愿。随着中国在欧洲影响力的日益增加，欧洲介入中美冲突的意愿还可能继续减弱。

五 跨大西洋联盟针对中国因素的战略协调的现实困难

自 1972 年尼克松访华以来，中美关系逐渐摆脱了之前 20 多年的对抗状态，进入到一个新阶段。美国形成了对华接触的战略设想：一方面，试图将中国纳入现行国际体系，推动中美在各个方面进行协调配合；另一方面，借助于部署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基地的足够力量，加强同盟国的合作，同东南亚国家结成紧密的伙伴关系，从而在亚太地区维持有利于美国的力量格局。从尼克松时代到奥巴马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主流是接触战略。本质上，这一战略设想了一个跟随德国和日本脚步的中国。与这些国家一样，中国有望在以美国为主导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中接受其地位。^① 这一战略取得了一些成效，中国确实部分地融入自由主义国际体系之中，特别表现为中国于 2001 年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参与到世界分工之中，并获得了利益。

^① 格雷厄姆·艾利森：《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陈定定、傅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297 页。

但是,美国的接触战略有更深刻的内涵,它希望中国向美国所希望的西方自由主义的方向发展演变,最终成为奉行西方式民主体制的国家。许多美国政治家和专家有一种看法,认为接触战略并没有实现预期的目标,中国并没有向着西方希望的自由主义方向发展变化,也不认可美国在亚太地区和世界的霸权要求。例如,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范亚伦认为,中美之间的矛盾除了利益分歧之外,意识形态(自由主义和权力主义)和价值观的对立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们各自对未来发展的期望、对未来世界秩序的认知并不相容,“由于它们之间的竞争更为强烈紧张,如上述,而紧张程度长时间缓和的概率更小,在相反情况下倒是概率更大”。^① 范亚伦认为,必须认识到中国的挑战是全方位的,不仅在地缘政治、军事力量和经济统计数据方面。他强调说,中国还将赋予这样的竞争领域以思想和理念之争的重要含义,以试图影响西方国家的社会情绪,而此时,美国似乎并未充分估计到美中对立中思想斗争的作用。

考虑到中国的军事潜力,以及它的经济 and 地缘政治地位的明显加强,西方不得不重新思考自己同这个迅速崛起大国的关系。现在,西方已经认识到中国崛起初显的影响力,中国不仅持续影响到世界经济和金融,而且还影响到国际安全问题的广泛领域,从朝鲜半岛局势和亚太地区稳定到联合国在非洲的维和行动,以及军备控制和努力应对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中国的快速崛起在客观上削弱了美国和欧洲在国际事务中长期垄断游戏规则制定权的能力。从更广泛意义上来说,中国崛起不仅影响到国际格局的变迁,还影响到世界秩序的转型,中国因素在不远的将来在美欧对话中将发挥主导作用。在跨大西洋专家团体中有越来越多的支持者信奉这样一种观点:西方如何应对中国崛起,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正在形成的新的世界秩序的方向与性质。

一些人主张动员西方资源以遏制中国的强大,他们的根据在于来自中国的挑战具有长期性和战略性。但是对于中国崛起将改变亚太力量平衡,并有可能涉及跨大西洋集团的利益,北约和欧盟并没有清晰的认识。正因为如此,当美国提议进行遏制中国的战略协调时,美欧之间缺少协调一致的共同立场。欧洲国家避免采取那些原本他们在协商时应该追随美国对亚洲政策的立场,明显不愿意支持华盛顿与北京的政治—军事对抗。因此,跨大西洋联盟针对中国因素进行战略协调

^① Aaron L. Friedberg, "Competing with China," *Survival*, June - July, 2018, vol. 60, no. 3, p. 9.

存在着不少困难。

首先，美欧利益的不吻合使这种协调缺乏共同的利益基础。特朗普政府认为，西方应该准备与中国进行全面的战略竞争，并且要利用所有的资源和影响力，包括外交、经济、信息资源和展示军力来平衡中国的影响力。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具有一定的对抗性，但是根据一些西方学者的观点，在战略形势继续变化的条件下，美国和欧盟在进行政治协调对待中国时，必须保证西方与这个新兴大国关系演化的最大稳定性和可预见性，必须防止发生那种可能会导致全球力量 and 影响力发生激烈重新配置的军事冲突。但是，来自中国的挑战对于北约盟国具有不对称性，美国和欧洲国家对于中国持续增长的力量有不同程度的接受意愿，这会阻碍跨大西洋联盟协调合作去对付中国，也会引发美欧在地缘政治议题优先次序上的分歧。

在一系列关于世界发展的关键问题上，欧洲和中国之间存在着更多共同点，这已超过美国与其北约盟国之间的共同点。例如，在维护世界市场的开放性，捍卫多边主义贸易框架，维护和发挥联合国、世贸组织等国际机构的作用，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维护 2015 年达成的伊核协议的有效性等方面，欧盟和中国的观点接近或者吻合。因为担心美国会绕开世界贸易组织而开始组建备用的新型贸易规则和贸易体制，欧盟还准备与中国在世贸组织改革问题上加强合作，发挥 2018 年中欧领导人峰会达成的世贸组织改革联合工作组的作用，^① 以保证所有世界贸易活动的参与者有统一的游戏规则。

美国和欧洲的利益不吻合就赋予了中国一个施展手段的空间，以极力避免北约国家在中美发生冲突时采取联合行动。正如一些西方专家认为，中国可能试图削弱美国的地位，办法就是把更多的欧洲盟国置于美国的对立面。为了防止联盟内部的分裂，美国则要让联盟成员基于跨大西洋的共同规则和价值观形成对中国的协调立场。^② 但是，对于坚持西方民主标准和价值观的呼吁与国家的战略、军事、贸易—经济和地缘政治利益的冲突是长久的。一些联盟成员出于现实利益考虑与中国积极发展关系，但却遭到了其他伙伴国的批评，说它们放弃了自由价值观，例如波兰、匈牙利和土耳其即属此列，而一些西方自由派也加入到这个行

① EU-China-A strategic outlook, p. 6.

② Bechná Zinaida, Thayer Bradley A., "NATO's New Role: The Alliance's Response to a Rising China,"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Summer 2016, vol. 69, no. 3, pp. 70 - 71.

列,赞同特朗普政府的对华强硬政策。

其次,美国对外政策优先权的变化使美欧对这种协调的路径和方向的考虑存在差异。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维护跨大西洋联盟关系的稳定成为美国处理国际事务的战略基石。但随着中国的崛起,在美国政治精英中形成了一种共识,即为应对中国挑战而必须采取步骤以防止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受到进一步侵蚀。对美国而言,现在不是跨大西洋关系,中美关系才是美国处理国际事务的决定性因素。中美关系已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优先方向。但从 21 世纪第二个十年开始,美国对外政策优先权的变化并不为欧洲盟国所熟悉。为了能够影响盟国,美国实施长臂管辖,跨地区实施制裁性法律,迫使欧洲盟国追随自己的政策。2017 年 8 月 2 日,美国通过《以制裁反击美国敌人法案》(CAATSA),虽然直接指向伊朗、俄罗斯和朝鲜,但也为利用政治、金融和经济手段来影响那些不遵守美国制裁决定的第三国提供了国内法依据,美国据此于 2019 年 9 月对中国进行了制裁。^① 欧洲盟国对这种变化以及未来可能会继续出现的变化还没有清醒的认识,它们只是开始明白新的地缘政治现实,但还不知道它是如何被改写的,仍旧继续恪守着从以往时代继承下来的理念及公理。美国所希望和要求的对华协调更多的是基于施压而非盟国意愿。

考虑到特朗普政府在处理国际事务时自私自利的风格倾向,许多欧洲国家领导人和政治理论家认为有必要在欧盟与亚太国家间就外交和安全问题进行制度性协调,以便在解决最重要的地区问题时摆脱美国的影响,并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欧洲国家担心,华盛顿自己的行为可能会激发该地区的危机从而使欧洲利益受到威胁。欧洲不能不对美国学界一些人对美国政策制定的影响力上升保持警惕,这些人主张使用严厉措施应对“中国挑战”。一些美国专家关于对抗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潜力的建议措施中,甚至提到了有关在该地区进行美国核力量前沿部署的建议,这暗示了有可能由美国军人在负责操作,一旦有必要,“采取核武器的限制行动”。^② 类似的行动计划很难得到欧洲盟国的支持,美国甚至没有考虑征求欧洲盟国的意见。欧洲在应对中国因素和亚太安全问题时,更希望通过

① CAATSA Section 231: “Addition of 33 Entities and Individuals to the List of Specified Persons and Imposition of Sanctions on the Equipment Development Department,” <https://www.state.gov/caatsa-section-231-addition-of-33-entities-and-individuals-to-the-list-of-specified-persons-and-imposition-of-sanctions-on-the-equipment-development-department/>.

② Aaron L. Friedberg, “Competing with China,” *Survival*, vol. 60, no. 3, June-July, 2018, p. 37.

对话、磋商和建立制度来约束中国，寻求问题的和平解决，而对使用武力和对抗则持慎重态度。相比之下，美国则更为直接，更具有现实主义色彩。

再次，美国在亚太的战略设计限制了协调空间。美国处理亚太安全问题的既有做法，其思维和操作方式在短时期内难以改变。美国一直通过一系列双边同盟条约建立以美国为中心的“辐辏”体系来主导亚太安全事务，对于欧洲国家参与亚太安全问题美国没有太多信心。2019年7月，美国根据2018年版《国防战略报告》制定了2018年版《国家军事战略》概要，认为美国相对于任何潜在对手的一个非对称优势是其庞大的盟友和伙伴网络，美国将扩展印太联盟和伙伴关系，通过与地区关键国家的合作，将双边和多边安全关系整合起来，以保持国际体系的“自由和开放”。^①现在，华盛顿为制衡中国而继续利用同印度洋—太平洋国家的同盟国关系和伙伴国关系。美国在这里下了赌注，以便在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四国”框架内建立紧密关系。为应对美国，中国也需要灵活地使用广泛手段去影响该地区国家，并防止出现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反华联盟。

特朗普政府扩大与欧洲和亚太盟国在网络空间控制领域实施针对中国的反侦察活动的合作。2018年7月，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峰会根据美国的提议通过了关于由联盟联合武装力量驻欧洲司令部下属的“网络空间操作中心”实施侦察的决议。^②可以想象，这个机构的活动将涵盖全球范围，而中国将成为它关注的主要对象。美国人将在这个中心发挥领导作用，在网络空间控制领域新的美国战略允许采取攻击性措施以应对敌对力量，包括阻止它们的网络攻击。

复次，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战略打击了协调热情。跨大西洋协调体现了美国承担防务责任，它建立在多边主义以及美国在一定程度上发挥“利他”功能的基础之上。但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战略明显将美国自身的利益凌驾于盟友的利益之上，以商人般的精心算计来谋求蝇头小利，重实利轻道义、重双边轻多边的做法使特朗普政府难以赢得盟友的信任，进而使欧洲国家与美国进行协调的热情大打折扣。

特朗普政府或许设想过组建“全球民主国家联盟”以遏制中国，但却因自

① “Summary of the 2018 National Military Strategy,” pp. 8–9, <https://dod.defense.gov/Portals/1/Documents/pubs/2018-National-Defense-Strategy-Summary.pdf>.

② “Brussels Summit Declaration,” 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official_texts_156624.htm?selectedLocale=en.

己自私自利的做法,单方面做出决定和行动使得许多盟国和伙伴国与美国离心离德。美国的许多政治家和专家批评特朗普,说他频繁发起贸易摩擦,拒绝与欧洲和亚太国家缔结多边贸易条约。他们认为,如果美国能够牵头达成这样的协议,就可以使美国的盟国在最小程度上去接近中国的市场。相反,特朗普的举动在肢解战后国际秩序,脱离自由主义模式的世界经济秩序,使得欧盟倒向了有可能根据新的看法在“大欧亚”框架内与中国进行合作的一边,包括与上海合作组织建立关系的想法。

为应对美国面临的威胁和挑战的负担的持续增大,特朗普要求欧洲盟国在涉及西方利益的亚太地区和其他地区的局势方面进行更加积极的合作。但是,目前美国政府对国际事务的独特做法,它与欧洲新自由主义原则的不兼容性导致美欧之间的尖锐对立,这都极大地限制了美欧协调集体应对“中国挑战”的可能性。特朗普政府只强调美国利益优先,强调盟国对美国的义务,这种权利归己、责任归人的利己主义做法无疑不利于美欧协调。

最后,全球战略关系的复杂互动削弱了协调能力。特朗普上台以来,先后退出《中导条约》等一系列攸关全球战略稳定的重要军控机制,使全球战略关系复杂互动,这种复杂化的全球战略态势事实上削弱了美欧的协调能力。鉴于中国在地区和国际安全领域不断增长的影响力,北约不可能把注意力从中国移开。但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欧洲面临着多重危机,欧洲国家认为威胁来自北约南部边界的恐怖主义和正在发展的难民危机,以及乌克兰危机,因而需要将北约的伙伴关系资源转向中东、乌克兰、格鲁吉亚和摩尔多瓦。^① 这削弱了欧洲国家深度参与东亚地区安全问题的意愿,东欧国家极力渲染俄罗斯的威胁,欧洲大国极力避免卷入美中在亚太地区的对抗。然而,考虑到中国和北约在国际安全领域的巨大影响力,它们未必能够在利益交织的问题上回避双边协调和配合,诸如打击第三国境内的国际恐怖主义和非洲沿海的海盗等。

跨大西洋联盟优先考虑的安全事务是欧洲安全问题,然而随着中国的地区和全球作用不断增强,它必将愈加频繁地进入美国和欧洲盟国的议事日程。北约不能无视中俄军事合作的发展,特别是这一合作已经触及欧洲。2017 年 7 月,中俄首次在波罗的海举行海上军事演习。2018 年 4 月,中国新任国防部长魏凤和

^① Rebecca R. Moore, “NATO’s Partners in the Asia-Pacific: Casualties of the Pivot Toward Europe?”, <https://theasiadialogue.com/2017/05/24/natos-partners-in-the-asia-pacific-casualties-of-the-pivot-toward-europe/>.

首次出访即选择了俄罗斯。2018年9月，中俄举行了“东方-2018”战略演习，这是两国首次举行联合战役指挥演练，两国国防部长在会谈后决定定期举行这种演习。^① 中俄在安全上需要相互支持，在现在和可见的未来，中俄将相互作为战略后方。两国地理的相邻和当代世界政治的现实为共同的利益提供了广泛空间。中俄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尽管存在交易的色彩但却有对抗美国共同的基础。有美国专家认为，自我利益和交易动机是中俄战略关系的阻碍因素，但是两国在多大程度上感受到来自华盛顿的威胁则使美国扮演了中俄关系催化剂的角色。^② 对抗美国霸权只是中俄协调的动机之一，两国在国际关系的重要问题上协调政策，这本身对全球战略关系就有重要影响。

特朗普总统并没有放弃让俄罗斯离开中国的想法，会时常谈论愿意与莫斯科改善双边关系的话题。美国国会而非政府是对俄罗斯施加政治和制裁压力的首要倡导者。但在对待中国方面，局势则是另一种情形：在制定严厉政策和通过反对中国的立法方面，恰恰是白宫扮演着首席提琴手的角色。中国干涉美国事务的话题有可能将会是特朗普在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的主要话题之一，他曾经在2018年秋季中期选举中利用这个话题。但是，在美国政治精英集团实际上分裂为两个对立阵营的现实中，炒作中国因素或者俄罗斯因素可能会使这个团体内部继续发生分裂。

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战略目标并未因冷战结束而发生变化，即防止任何敌对大国或者国家联盟在欧亚地区直接或者间接地获得经济和地缘政治主导地位。美欧联盟针对中国的战略协调，据西方分析人士的看法，是西方影响世界秩序转型进程的重要但未使用的资源。但是，类似协调配合的前提条件由于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政策而减少，这引起了美国与盟国的严重分歧。在奥巴马总统时期，美欧跨大西洋关系可能处于最好的时期，美国先是提出“重返亚太”，而后正式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这是美国对中国实力增强而做出的特有的、超乎寻常的、罕见的反应。在目前条件下，考虑到特朗普总统外交哲学的特点，他虽然向欧洲提出了许多要求，但大概可能并不指望美国对亚洲的政策能获得跨大

① “Russian and Chinese Defence Ministers Inspects Command Posts at Vostok 2018,” http://eng.mil.ru/en/news_page/country/more.htm?id=12195206@egNews.

② “Russia And China Will Now Hold Military Exercises ‘On A Regular Basis’,” <https://taskandpurpose.com/russia-china-military-exercises>.

西洋联盟另外一方对亚太重要性的估量。很显然,跨大西洋联盟针对中国因素的战略协调存在困难,这种协调的前景令人关注。

六 跨大西洋联盟针对中国因素的战略协调的前景展望

中国与美欧联盟相互关系的现实在于:它们相互视对方为“异质”文明,并且这种观念愈加影响到自身的物质利益和精神认知,从而产生了严重的不适感,甚至会觉得对方是一种现实的挑战和威胁。一方面,中国因其自身经济影响力和地缘政治影响力的持续提升而愈加明显地感觉到自己受到来自美欧跨大西洋联盟的限制乃至充满敌意的压制,这种感觉虽然还谈不上已经达到了愤怒与难忍的地步,但是不适感却是明显存在的;另一方面,跨大西洋联盟认为它们针对中国崛起的战略协调是西方应对世界秩序变化的重要资源和工具,所以它们以深切忧虑的心态看待中国崛起,认为这是前所未有的新挑战和新威胁,于是采取限制和压制行动就成为顺理成章的想法及做法,尽管不同成员可能对具体的应对方式存在认知差异。

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将会继续壮大,也将会愈加感受到跨大西洋联盟的限制或者刻意压制,从而也会调动资源和力量进行抵制;与此同时,跨大西洋联盟虽然存在协调的困难,但也会努力克服困难加强协调,联盟绝不会心甘情愿地主动撤除针对中国的限制及压制举措。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跨大西洋联盟针对中国因素的战略协调的最终边界在哪里?

可以认为,中国和跨大西洋联盟之间如果在亚太地区能够形成一种既有竞争又有合作的关系,那么,联盟内部的战略协调将继续存在,因为这是中国和美国及其欧洲盟国三方均能接受的现实。换句话说,如果跨大西洋联盟想要保持内部团结和协调持续,就要致力于促成中国和跨大西洋联盟之间形成既有竞争又有合作的格局。反之,中国和跨大西洋联盟之间如果在亚太地区的竞争失去控制,陷入无序竞争的局面,那么风险会显著增大,甚至会造成区域性冲突并危及世界和平,而且美欧联盟内部的协调配合也将破产,可能导致美欧联盟中的个别重要国家脱离联盟并且成为中国的盟友。如果这一前景是可能的,那么不仅联盟的内部团结将成为难题,联盟也存在裂解的风险。

得出上述结论并不是纯粹的主观猜想,这主要是基于亚洲复兴所带来的深刻

影响，以及中国和平崛起的战略选择得出的结论。

第一，亚洲的重要性。世界正在发生巨变，亚太地区已经成为世界经济最具活力的地区，世界政治中心迟早也会转移到亚太地区。中国既是亚洲又是亚太地区的重要国家，所以美欧同盟不同中国进行合作是没有出路的。当前，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想所主张的自由市场经济正在隐退，西方行为准则和价值标准的影响力正在减退；关于世界正在进入“亚洲引领”时代、世界正在进入“亚洲世纪”的话题成为讨论的热点。有学者将亚洲界定为地缘经济概念，其范围西至阿拉伯半岛和土耳其，南至澳洲和新西兰。“现在，亚洲经济圈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50%，同时占全球经济增长2/3的份额。世界中产阶级的消费额在2015—2030年有望增加到30万亿美元，其中欧洲的中产阶级预计只占1万亿美元，其余的绝大部分都来自亚洲。亚洲无论是生产、出口还是进口、消费的商品数量都超过其他地区，亚洲各国更多与其区域内国家（而非欧洲和北美）进行贸易和投资。亚洲拥有世界上几大经济体，持有世界的大部分外汇储备，经营着许多大型银行以及工业、科技公司，同时坐拥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全球60%的人口在亚洲，亚洲人口是欧洲的10倍、北美的12倍。随着世界人口逼近100亿，亚洲人口将永远多于其他各洲人口的总和。亚洲现在有了发言权。”^①

第二，亚洲具有多样性。今天亚洲在经济生活方面至少呈现出四个部分：一是发达的亚洲，包括日本、韩国、新加坡等所谓的发达国家，还包括更广泛地理范围内的澳大利亚、新西兰，这些国家向邻近地区提供资本和技术。2013年到2017年，相关国家占亚洲地区外国直接投资的54%。越南的外国投资有33%来自韩国，缅甸35%和菲律宾17%的外国直接投资都来自日本。二是中国，中国是该地区的经济之锚，为邻近地区提供了联通和创新的平台。中国2017年专利申请量占全球的44%，充分体现了其快速增长的创新能力。^②三是东南亚为中心崛起的亚洲，它们仍然有大量劳动力，提供了长期增长的可能性。四是亚洲待开发的处女地，主要代表是印度。它是潜力巨大的国家，承接着大量来自其他地区的投资，也蕴藏着成为消费市场的巨大可能性。

“亚洲的多样性”不是什么新鲜的提法，但它比通常意义上理解的地理、历

① 帕拉格·康纳：《亚洲世纪：世界即将亚洲化》，丁喜慧、高嘉旋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年版。

② 华强森、成政珉：《21世纪将属于亚洲》，《参考消息》2019年10月12日。

史、宗教、语言、经济和文化上的多样性有更深远的意义。今日亚洲的多样性不再是一盘散沙，各自为战，而是相互补充、相互完善的多样性。亚洲的多样性是亚洲的特色所在，是根深蒂固的文明延续，历史上、现在和将来永远也不可能由少数几个国家将亚洲整合起来，以阵营化的方式搞对抗，像两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欧洲那样出现两大军事集团的对立和厮杀。壁垒森严的集团式对抗不仅在军事上和安全上不大可能，即便是在经济上也不可能出现这种集团对立的现象。

第三，亚洲的亚洲化并不意味着中国化。在历史上，中国是一个东亚大国，是东亚区域国际体系的中心，对东亚国家影响最大，后来随着朝贡体系的瓦解，东亚国家逐渐脱离了中国的影响。亚洲的多样性意味着亚洲的亚洲化，而不是亚洲的中国化。亚洲化使得亚洲国家的自主性不断增强，这意味着它们处理内政外交时将会更多地从自身利益考虑，更少地屈从于来自外部的威逼利诱。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8亿多人口摆脱贫困，国家整体面貌发生巨大变化，是人类历史上的经济奇迹，也令亚洲国家称羡有加。可是，中国的经济奇迹得益于超强政府实施出口、投资和基建政策推动经济高速发展。支撑中国快速发展的条件在其他国家很难同时具备，单论超强政府这一点就令亚洲国家望中兴叹。因此，亚洲发展中国家只能羡慕，却很难将中国的经验学到手。换句话说，中国奇迹及其发展模式无法复制拷贝。另外，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有的表示欢迎，有的则表示谨慎。“亚洲的地缘政治现状告诉人们，因邻国和国家内部反对势力的顽强抵制，地区霸权很难维持，更别提永久霸权……亚洲将一直拥有众多独具特色的文明，其中许多文明，包括中国、印度和伊朗，都有历史中心主义和排外的特点”。^①对于强大的中国提出的发展倡议，亚洲一些国家必然会从地缘政治角度进行考虑和评估，美欧联盟误解亚洲会中国化是出于它们不了解亚洲的多样性，低估了亚洲在亚洲化。

第四，亚洲不太可能完全彻底地排斥美欧存在。如果说欧洲化是19世纪世界的特点，美国化是20世纪世界的特点，那么亚洲化将是21世纪世界的特点。美欧介入亚洲事务已经有两个世纪了，其间亚洲因借鉴和学习美欧而加快了自己的发展进步。亚洲的多样性意味着亚洲实现了继承传统与吸收外来的结合，正是这种结合使亚洲的多样性具有新的时代特征。全球国际体系在20世纪初形成后，

^① 帕拉格·康纳：《亚洲世纪：世界即将亚洲化》，第50页。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军国主义的“大东亚共荣圈”政策遭到彻底失败，战后亚洲一些国家的经济繁荣在很大程度上是亚洲和美欧共存共荣的结果。战后的历史启迪人们，需要继续发展的亚洲不太可能完全彻底地排斥美欧的存在。在21世纪，亚洲国家的自主性固然会不断增强，可是亚洲人的务实主义风格决定了它们仍然会同美欧和睦相处、共享繁荣。

第五，中国寻求和平崛起的态度。中国领导人深知中国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一直强调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不谋求霸权，不谋求扩张。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了《新时代的中国与世界》白皮书，进一步对于中国的内政外交做了说明和解释，白皮书再次强调了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它指出，中国不“输入”外国模式，也不“输出”中国模式，不会要求别国“复制”中国的做法；中国绝不走“国强必霸”的路子，无论自身如何发展，中国永不称霸、永不扩张、永不谋求势力范围。白皮书对于中国的角色做了定位和解释，它指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和平发展、繁荣稳定离不开中国；中国始终把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中，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① 中国政府的宣示说明它有意愿解决同跨大西洋联盟之间的分歧矛盾，继续寻求合作。美国政府越了解中国的目标，就越能为解决分歧做好准备。^②

总之，跨大西洋联盟针对中国因素的战略协调的未来命运，将取决于同盟能否同中国结成有序竞争及合作的关系。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西方是如何应对中国崛起的。战略竞争关系将长期存在，但如何管控好这种关系，并使其避免滑向对抗的轨道，是西方有识之士需要认真思考的重大课题。

①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新时代的中国与世界》，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34、35、53页。

② 格雷厄姆·艾利森：《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第314页。